

大足历史文化丛书

饶国梁饶国模诗文选注

李传授 编注

中国言实出版社



大足历史文化丛书

饶国梁饶国模诗文选注

RAO GUOLIANG RAO GUOMO SHIWEN XUANZHU

李传授 编注

中国言实出版社

大足历史文化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辛世杰 江涛 宋彬 黄铭

主任委员：陈中举

副主任委员：陈廷钊 宋朗秋(常务)

委员：蒋朝彬 陈仲伦 杨烈 陈建华 黎方银

编辑部

总编：宋朗秋

副总编：黎方银 李传授 张划 刘晚白 黄宇 梁德茂

编辑：余开和 蒋光华 陈灼 覃新生

赠饶国模女士

倭寇侵逼，国府西迁。重庆襟江背岭，成为战时首都。远地来人，云集潮涌。吾辈初至此邦，几难措足。铜梁（大足）饶国模女士，豪爽好客，渝郊红岩经营农场，欣然延纳，结庐其间，忽忽八年矣。当胜利还都，赠得一绝志谢。

八载成功大后方，
红岩托足少栖惶。
居停雅有园林兴，
款客栽花种竹忙。

董必武

1946年4月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墓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墓



重庆大足县国梁镇饶国梁纪念馆（1929年建） 刘晓白 摄影



重庆化龙桥红岩嘴饶国模故居，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办事处曾设于此，现为重庆红岩纪念馆



重庆大足龙岗山桐子湾饶国梁烈士纪念碑 伍华天 摄影



饶国模留影 刘圣化供稿

《大足历史文化丛书》序

周 勇

大足,一个让人景仰的地方,一个令人生出无数遐想的地方,也是一个令我流连的地方。其中要因,皆因它丰厚的历史与文化。

近年来,大足县委、县政府决定编纂《大足历史文化》丛书,首先这是记录历史的需要。今年是大足建县 1250 年,出版此书是对建县 1250 年最好的纪念。其次是传承文化的需要。大足以石刻而闻名天下,具有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灿烂文化。这些年来,研究石刻艺术的著作汗牛充栋,但是系统地研究大足文化的著作却并不多见。第三,这是繁荣文化的需要。21 世纪的中国,已经以一个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大国傲立于世界。今日之中国急切地呼唤着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到来,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已经提到了重要日程之上。这部丛书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也领先着重庆各区域文化的建构。最后,这也是“资政育人”、“以文化人”的需要。

因此,编纂《大足历史文化》丛书,这是一件仰缅先贤,服务今天,嘉惠后人的大好事,是大足县历史文化工作的一项基础建设,是大足县以至重庆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具体体现。气魄可嘉,成就可贺。

大足,自古居巴蜀之交,处成渝之间,地域及文化形成亦两两交融,兼具东西川之特征,由此造成大足 1000 多年来颇具个性的漫漫历程。

大足建县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因境内“大足川”(今濑溪河)而得名。大足县境古为巴国之地,秦汉以降为巴郡管辖。到晚唐时期,国家战乱。时任昌元县令之韦君靖,组建强大地方武装,保境安民,率军平叛,为唐室屡建殊勋,被朝廷授“使持节,都督昌州诸军事,守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大足遂为统辖昌(今重庆永川、荣昌、大足)、普(今四川安岳)、渝(今重庆)、合(今重庆合川)四州都督府治地,同时又为昌州治所在地。历经唐宋,近 400 年。形成了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社会安定的兴旺景象,造就了大足辉煌的历史时期。

历览文史千年,大足是海棠香国根之所在,大足也是世界上最早刊印地图《六经图》的所在,大足更是创造了中国石刻艺术最后高峰之所在。更让我们感佩的是大足产生了保境安民的韦君靖,大足石魂赵智凤,忠节知州赵昂发,忠君不二胡子昭,不向权贵低头的刘天成,元代农民起义领袖韩法师,明代农民起义领袖蔡伯贯,清代反洋教起义领袖余栋臣,保路同志军领袖张桂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唐赤英,红岩主人饶国模,龙学泰斗杨明照等一批杰出人物。正是这历经千年的悠远历史,正是这灿烂文化的代代传人,造就了今日大足之“大丰大足”。

历览千年前贤文治武功,邑人曰:“安定则兴,宽恤则荣,唯实则成”,是为历史经验,亦可引为教训。

大足历史文化具有民族艺术的代表性。在公元5世纪和7世纪前后,在中国北方先后形成了以山西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两次造像高峰。然自此以后,中国石窟艺术停滞不前,呈危急续绝的状况。从公元9世纪勃兴的大足石刻,与云冈、龙门石窟“鼎足而三”,是中国晚期石刻的代表和最后的丰碑,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高峰。这是大足人民对中华文化最重大的贡献。

大足历史文化具有文化品质的包容性。中国的石窟艺术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从公元3世纪起传入中国。在此过程中,印度艺术与中华文化相互融合,产生了灿烂的奇葩。细观山西云冈石窟,受印度犍陀罗和笈多式艺术的影响,多呈“胡貌梵相”的特点。及至洛阳龙门石窟,印度文化的痕迹尚存,但已经不甚明显,而呈现出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特征。到了大足石刻时期,其石窟艺术以集释、道、儒“三教”造像之大成而异于云冈和龙门,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这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经典之作,是中华文化对世界历史文化的杰出贡献。因此,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包容性还体现为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融合。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信神不信教,信仰多元化”,而大足石刻就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产物。在大足石刻中,既有“三教”分别造像,又有释、道合一造像,更有释、道、儒合一造像。这表明,公元10-13世纪,“孔、老、释迦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的“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已经形成。同时,大足石刻造像题材丰富多样,呈现出信仰多元化的趋势。这种显密互存,三



教会同为特征的文化品质的包容性，成为后世民间信仰的基础而影响深远。

大足历史文化具有文化创造的广泛性。从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讲，大足石刻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的一页。中国佛教密宗盛行于公元8世纪初，后来在中国本土逐渐衰落。而9-13世纪出现的大足石刻表明，密宗在四川、重庆不仅没有绝迹，而且相当兴盛。正是柳本尊（晚唐，9世纪末）自创密宗，号称“唐瑜伽部主总持王”弘扬大法，高僧赵智凤（公元12世纪-13世纪中叶，南宋中期）承持其教，号称“六代祖师传密印”，尤其是创建了宝顶山摩崖造像，这座石窟史上罕见的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从而把中国密宗史往后延续了400年左右。大足石刻的广泛性还在于宗教艺术与民间艺术相结合。就此前的石窟艺术而言，多具有皇室家庙性质，体现着皇家的意志。但是，大足石刻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下层群众的思想与情感，反映了民间宗教信仰的诉求，由此产生了所谓“人间佛教”。还需要指出的是，大足石刻比较集中地为我们展现了石刻镌工的面貌，这说明大足石刻既归功于韦君靖、赵智凤，也归功于众多留名或不见经传的石刻工匠，大足石刻是上层人物与下层工匠共同创造的艺术结晶。

大足历史文化具有对巴蜀文化的独特贡献性。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化源远流长，文物、典籍代代不绝。但反映民间风俗的形象资料甚少。大足石刻虽是一座佛教殿堂、石刻艺术博物馆，同时又是一座民间风俗画廊，展现出浓厚的世俗信仰和纯朴的生活



气息。由于它地处巴蜀之间,因此可以认为,它是9-13世纪的四川社会为原型的精心创作,是一部立体的、形象的、完整的唐宋巴蜀民间生活场景,从而把石窟艺术生活化推到了空前的境地,完成了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既是巴蜀文化的瑰宝,更是巴蜀文化为中国石窟艺术贡献的精品,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

大足历史文化具有革命文化的传统性。大足以它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著称于世,也使它在近代以来的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斗争高潮迭起,革命人物辈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足发生过1886-1890年的三次打毁龙水天主教堂的斗争,发生过1891、1898年大足余栋臣举行的反洋教武装起义;产生过被孙中山先生称为“厥为世率”的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产生过毕业于黄埔,参加过北伐及南昌起义,留学过苏联步兵学校,担任红三军参谋长、洪湖警卫师师长的唐赤英。历览史册,大足县涌现出护国之役烈士4名、红军烈士1名、抗日阵亡将士457名、解放战争烈士23名、征粮剿匪烈士127名、抗美援朝烈士244名、西藏平叛烈士64名、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烈士42名、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烈士14名、因公殉职见义勇为烈士90名。

大足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地方。大足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地方官员中热心于历史文化研究者代不乏人。主持这套丛书的宋朗秋同志,曾经担任过县政协主席,在职期间便热心于历史文化建设,离休后更多往实地考察,钻研学习石刻文化及相关理论、知识,著述不断。他

组织编纂这套丛书的黎方银、张划、李传授等 20 多人,或为离休老领导,或为退休老同志,或为当年领导干部、县志主编,或为当今历史专家、文化学人。这些同志在离退休之后,孜孜于大足历史,倾心于大足文化,搜集资料,深入研究,成果丰硕。他们秉持对历史负责,对当代负责,对自己负责的精神,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浪费时光,不断追求王国维提出的学术研究“三境界”^①,令人叹服,使人感动。

《大足历史文化》丛书是第一次编辑出版,其填补空白的作用令人敬佩。或许正因没有参照的缘故,其对大足历史文化内涵的论述还有待进一步开掘,各集撰著的水准也不尽平衡,许多结论也更有待时间的沉淀和实践的检验。我相信,有时代的需求,有一批热心于此的专家学者,立足于深厚的文化沃土之上的“大足历史文化”,必定会呈现出根深叶茂的美好愿景。

是为序。

2008 年 4 月 20 日

(周 勇,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注:①王国维先生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引自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 26，第 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饶国梁饶国模诗文选注》序

宋朗秋

本书是继《莲荷禅韵》之后出版的《大足历史文化丛书》的又一本书。这是为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和其胞妹饶国模加入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而编印的。

饶国梁、饶国模大足云路乡(今国梁镇)人。生于耕读世家。父,树奇,母,雷氏,生有三男四女。三男取名国栋、国梁、国材,国梁第二。国模在四女中最小,国梁称她为四妹。国梁生于1888年,今年刚好是他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国梁幼年,聪明好学。在万古大雄寺等私塾读书时,就熟读经史和古代名家诗词,能诗善文。国梁一生十分短暂,英勇就义时才二十三岁。人生虽短,却为我们留下了十首满怀革命激情、思念亲人的诗篇和一篇充满浩然正气的绝笔书。在这些诗文中,可看到烈士“拼命趁青春”,“得死可成仁”,“到处青山在,好收白骨藏”,“头颅欲试剑初磨”,“志士心肝索虏头”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豪情。也看到烈士对亲人的思念和为国为民而舍亲情的感人诗句:“此生难报本,得死可成仁”、“不克成名士,何为恋故乡”、“尽忠难尽孝,无志即无光”、“怎奈国多难,无心暇鼓弦”。

国梁在法堂上,坚强不屈,正义凛然,怒斥清朝的黑暗统治,但求速死。他说:“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索取纸笔,奋笔一挥,写下《绝笔书》。这些诗文中的爱国主义光辉思想和浩然正气将永垂青史。

饶国模,自幼就以二兄国梁为榜样,立志、立业、立身。先以教育救国,去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她为践行“实业救国”,20世纪30年代初,在重庆买下郊区化龙桥虎头岩红岩嘴数百亩荒地,创办大有农场。1939年,国模欣然同意把大有农场作为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办公地点,八年间,不收分文租金。在此八年期间,饶国模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龙潜等同志过往甚密,并时有诗词唱和。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下榻红岩,国模在宴会上即兴为毛主席吟诗。1948年在极其困难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至今年已是六十周年。建国后她又把大有农场无偿捐赠给国家,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他年凯旋高歌时,红岩即是众人家。”国模的诗文看出她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厚望,对日寇的愤恨,对住在红岩家园客人的尊重、景仰以及对亲情的表露。她当时就认识到:“红岩有幸留英杰,中流砥柱尚有人。”“此地英雄留胜迹,红岩异日放光芒。”昔日的大有农场已成今日中外闻名的红岩纪念馆,红岩精神在神州大地将永放光芒。

我们在选编饶国梁、饶国模的诗文时并非看重诗文的艺术性,而是看重诗文中表现出来的高昂革命意志,为国为民舍身求真理的爱国主义情操以及与时俱进的革命